

城市传:小说家的历史想象与书写

文学对城市的书写自古就有。汉代文学家铺陈都城繁华富丽的“京都赋”，宋朝描述城市风土人情的《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现当代文学中亦有不少作家以书写城市而闻名，如老舍、张爱玲、西西等。工业革命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学对城市的书写愈加普遍，波德莱尔、艾略特、卡夫卡等作家对于城市的刻画无不被读者熟知。

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公共场域，日渐从文学背景走向前景，成为文学书写对象本身。随着《伦敦传》《南京传》《北京传》等城市传记的相继问世，城市传记书写作为研究课题方兴未艾，日益凸显其探讨与研究的价值。

城市传记的重点在哪里？中国城市传记如何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历史研究与文学书写之间找到立足的书写点？上月末，由译林出版社主办的“城市文学书写论坛”研讨会就城市传记书写展开对话。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

城市传记为何成为热门选题？

21世纪以来，城市传记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出版与书写行为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首先是与城市传记相关的集体出版行为。近年各出版社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版了与城市相关的系列书籍，激发国内众多作家写作城市传记欲望的《伦敦传》就属于译林出版社的“译林·城市故事”系列，而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海南岛传》与《广州传》分属于新星出版社推出的“丝路百城传丛书”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大湾区城市传记系列。

面对迅速发展变化的城市，一些作家们不满足于仅仅以单篇的散文或者将城市作为故事背景来写作，在深耕某一城市文化写作多年后，将城市作为具有性格的“人物”，以史实为基础运用文学手法进行写作。叶兆言与叶曙明都是在关注与写作南京与广州多年后，完成了《南京传》与《广州传》。

近年来，城市传记书写关注的城市也更加多样，北京与上海已经出版的城市传记作品数不胜数。其他城市的传记作品也日渐丰富，且类似的书写在模式与数量上随着时间推移都在不断增长。

为什么城市传记成为一个热门的出版与写作选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命题，“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和城市发生关系，城市的显示度和关注度自然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像《伦敦传》这样建制宏大的城市传记引进中国，激发中国作家挑战中国城市传记书写的欲望。”邱华栋就表示他是在阅读了《伦敦传》之后才有了写作《北京传》的雄心。

当然，与全球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怀旧思潮也催生了城市传记的书写。随着城市化加快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不少城市建筑被拆除或重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急速变化重组，传统文化观念被摧毁。在冲突与断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迫切地寻求自我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自然而然地，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文化逐渐代替了怀乡书写成为缝合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整体的中介。

非虚构：如何处理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

城市传记书写包括城市历史，更重要的是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记忆。前者属于历史，而后者属于文学，城市传记更愿意以文学方式处理历史内容，希望书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实。书写内容并非历史学意义上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文学意义上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那么如何理解“文学意义”？作为非虚构写作，如何处理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定要给文学性的城市传记下定义，我觉得它是基于历史事实，有着个人精神立场和文学想象，发明和建构独特的叙事秩序的综合体。”在何平看来，史学的“城市历史”和文学的“城市传记”的区别就在于写作者非凡的个人想象，尤其是细节，但历史事实却是写作的基础。“小说家介入城市传记写作可能会开拓城市传记的疆域，但其基本前提是这样的小说家应该是对历史抱有敬畏心，而不能把城市传记变成纯粹天马行

空的虚构。”

《上海传》的作者小白，也认同史实是城市传记写作的基础，但城市传记写作的本质还是讲故事的叙事写作。“在我的理解当中，非虚构也是从虚构来的。城市传记写作不是说我要非常专业地去研究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文化或者城市的空间发展，它是一个叙事作品。我是依据实证材料去写作，但是它的本质上还是一个叙事写作。”

如果明确了历史事实是城市传记写作的基础，那么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写作者如何依照其写作的题材与内容去选取剪裁史料，这还属于技术上的问题。对于写作者而言，更重要的是他秉持着怎样的精神立场与历史观念。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强调作家应该应该确立一个统一的精神立场和价值尺度。“各种政治事件，作家怎么确定自己的精神立场？你如何去评判这个时代的人物、事件、恩怨、政治斗争，以及人民生活是好还是坏？而且这个价值观念也不能是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标准。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做出一个不同的评价。”

写作重点：芸芸众生与城市地方性精神

梳理中国文学史，可以说城市传记的书写传统源有二：其一源自地方志，其二是笔记小说对城市的书写。相比突出客观中立的地方志，近年来的城市传记书写更多地继承了笔记小说对于城市风土人情的书写，特别是对于普通百姓生活的关注。描绘人物，书写人性，正是小说家的特长所在。

“我觉得人是附着在城市这个空间当中的。我不是太喜欢写王侯将相，虽然他们是城市的主要统治者，事实上，北京两千多万人，芸芸众生才是城市的主体。”邱华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北京传》主要是着眼于空间的变化，把王侯将相放到次要的地位来审视，“如果再写一个80万字，更多的可能都是城市日常生活的情况。因为日常生活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不同自然地理空间、外在物质条件形成不同的城市，人们的生产活动又孕育相应城市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描写普通百姓的城市日常生活也就是在描写城市文化，突出城市的地方性精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桂林注意到叶兆言在《南京传》中书写南京历史时突出描写了南京文化以及南京文化的生成历史。“写一个城市，不可能离开城市的文化，尤其像南京这样的文化之城。从总体上来看，《南京传》是以王朝更迭的这样一个政治线条来写历史，但是在政治的谱系之外，作者浓墨重彩地写南京文化的生成。在南京文化的生成中，作者注意到了地形风貌的参与，这体现出一种人文地理学的视野。作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看到了这个物种或者语言对南京文化的塑造。”

城市地方性精神体现了人与城、城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突出自身与其他城市的不同，而这就是城市传记的书写重点。在复杂交织的互动影响中独特的地方性精神意蕴产生了，它是某一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城市传记成功与否，也取决于是否在历史故事的讲述中凸显一座城市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精神意蕴。

声音 | 写作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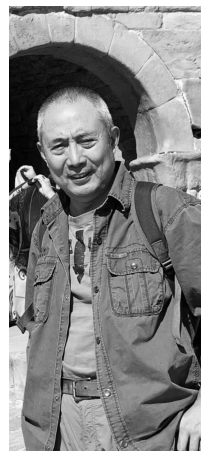


邱华栋

我不想写成一个“历史上的人和事儿”，不想去重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个城市它像一块地衣在大地上生长，我主要着眼于随着时间推移它的空间结构的变化。

比如最早它是蓟国的首都蓟城。到燕国的时候，它作为燕国的都城，它在什么位置，它有多大规模。到了汉代，它是广阳郡的郡治，相当于一个省和州府之间的一个行政区划。比地级城市大，比省会城市小。到了唐代它又是幽州。特别是当代，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城市主政者总体的规划，京津冀怎么一体化，新机场落成……主要是突出空间感。在这个空间感里有一个时间的线索。基本上是薄古厚今，越往后笔触越细腻。

——邱华栋《北京传》



叶兆言

有一本《伦敦传》，很多学者觉得这本书好得不得了，我看过之后，没觉得好得不得了，但我觉得为一个城市立传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光写南京的历史，我并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想写一写中国历史，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只有两个城市特别适合讲中国的历史，一个是北京，它是中国的中心，特别适合于叙述大一统江山的历史。还有一个城市就是南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华文明核心的一个“备胎”。而西安、洛阳，可能更适合讲汉唐这种断代的历史。

南京这个城市和中国的历史形成了一种反差——当中原王朝很不幸的时候，需要一个地方能躲避的时候，南京就是一个选择。当中原王朝很稳定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被警惕，那么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打压南京。所以说，南京这个城市无论兴盛还是衰落，都是可以很好地来说中国历史的。

——叶兆言《南京传》



叶曙明

我觉得写城市传记，就和写人一样，他要有独特的体型外貌、言谈举止、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要写出这些，这个人才能立起来。为广州立传，最大的难度，并不是考证某座房子几时盖的、某条马路几时开的，而是怎么把城市的性格写出来。首先我自己要能够理解这种城市性格。有一段时间，我家就能看到珠江，我每天都看着这条江无声地流淌，好像天天一样，又好像天天不同。慢慢地，我发觉用江河来形容广州，是再贴切不过了。平流缓进，不温不火，顺则有容，逆则有声，最后汇入大海。写城市传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把握得住这个城市成长的节奏，而不仅仅是写出它的趣闻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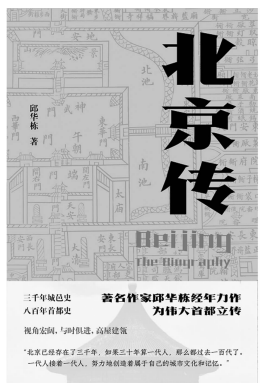
——叶曙明《广州传》



孔见

本书《海南岛传》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其中的文字不仅是想象力的产物。在尊重基本史料的前提下，笔者力图再现历史的现场，复活人物的原形，并试图与他们说上话，在细节上做出必要的展开。众说纷纭的地方，也尽量在占有资料的条件下，做出采信的选择。无法确凿又不能证伪的史实，则作为一种可能性加以演绎。至于文体的运用，我愿意保持切换的自由度，将所叙述的事物置于开阔的视野，加以观照与处理，以获得充分阐释的回旋余地，而不止步于客观的罗列。当然，我无意要写一本通史或全史，只是通过一些有意思的人物活动和事件的演变，寻找走进历史深处的入口。

——孔见《海南岛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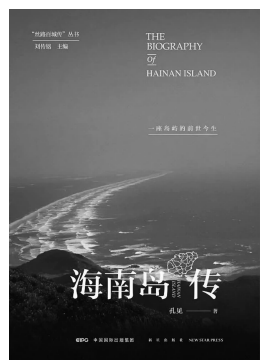
《北京传》



《南京传》



《广州传》



《海南岛传》